

战争后的马华文学“故乡”所指—— 以《南洋散文集》《南洋青年散文集》为例

潘碧华、张彦涵*

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

摘要

二战后的马来亚千疮百孔，在修复国家和个人精神方面，文学作品的数量屈指可数。故《南洋散文集》和《南洋青年散文集》所收录的散文，前者主要跨度战争前后的百姓生活走向，部分收录的文学作品可见不同时期南洋华人对于“故乡”所指的变化。本文旨在分析文集编辑的背景、选编标准及其内容主题。透过分析这些作品，有助于我们探讨与了解南洋华人对于乡的变化所带来的惆怅，从而梳理出华人之于国家的离散情绪的根本，并从中梳理国家认同和身份纠结的问题。《南洋青年散文集》编辑张復灵汇集了来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 26 篇青年作家文章，展示了战后南洋青年在现实和向本地化身份的转变。相比之下，《南洋散文集》编辑韩萌，则汇集了 34 篇作家的文章，选文捕捉了更广泛的历史视角，反映了南洋华人对于向往中国的发展脉络。战后华人社区身份的演变对于理解东南亚更广泛的文化和历史动态至关重要。

关键词：南洋散文集，南洋青年散文集，故乡，韩萌，张復灵

* 潘碧华，博士，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张彦涵，博士研究生。

Post-War Malayan Chinese Literature: Examples From “Nanyang Prose Collection” and “Nanyang Youth Prose Collection”

Associate Prof. Dr. FAN Pik Wah, CHONG Sin Wah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a*

Abstract

Malaya was left in a state of significant disrepair in Post-World War II period, with few literary works addressing the restoration of both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individual psyches. The proses in the “Nanyang Prose Collection” and the “Nanyang Youth Prose Collection” predominantly cover the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before and after the war. Some of these pieces reveal shift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s concept of “homeland” over different period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editorial backgrounds, selection criteria, and thematic content of these anthologies. This analysis helps delineate the fundamental causes of the diaspora’s emotions regarding their homeland, addressing issue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complexities of identity struggles.

Zhang Fuling, the editor of the “Nanyang Youth Prose Collection”, compiled 26 proses from young writers in both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howcasing the post-war reality and the transition towards localized identities among Nanyang youth. In contrast, Han Meng, the editor of the “Nanyang Prose Collection”, compiled 34 proses capturing a broader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 is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the Chinese in Nanyang and their longing for China.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post-war Chinese community’s identity is crucial for comprehending the broader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dynamics of Southeast Asia.

Keywords: Nanyang Prose Collection, Nanyang Youth Prose Collection, homeland, Han Meng, Zhang Fuling

一、前言

马来亚自中国经历太平洋战争、到整个东南亚经历日据时期，整体而言南洋华侨对于“乡”的意识有着微妙的转变。他们因为不同的原因认同这片土地，但是本质上还是倾向于依恋中国。这条剪不断理还乱的脐带是因为民族本身的各种客观因素，例如：传统节日、文化习俗、语言歌谣等等。南洋华侨因各种在地政策而形成华人社会，摆脱了华侨身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居民”的身份认同等复杂过程，从“回乡”（中国）转化为以马来亚作为“故乡”的概念。

战后南洋华人的故乡意识处于复杂而矛盾的转型阶段。一方面，许多华人仍将中国视为精神上的祖国与文化故乡；另一方面，长期定居南洋所形成的生活经验，又逐渐促使他们重新思考自身与马来亚之间的关系。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南来作家、华侨文学或马华文学的发展脉络，对于不同世代作者如何理解“故乡”，以及这种理解如何随着历史环境而发生变化，仍缺乏系统性的讨论。

基于此，本文以韩萌主编的《南洋散文集》与张復灵主编的《南洋青年散文集》为研究对象，透过比较两本文集的编辑背景、选文取向及文本内容，探讨战后马华文学中“故乡”的具体指涉为何，并进一步分析不同世代作者对于中国与南洋的认同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反映的身份意识转变。

韩萌主编的《南洋散文集》、方修的《新马华文学大系：散文》里，可从散文的叙述中一探当时人们对“故乡”的明显转变。战争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限将大部分人们午夜梦回所牵挂的故乡（中国），而将马来亚视为落叶归根家乡的人们似乎在一种“集体意识”里也认命地接受南洋；部分作家说马来亚之于他们是一个“出生地”、“侨居地”，而他们的故乡依旧是中国。这点可从韩萌主编的《南洋散文集·前言》部分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从依偎了十年的祖国，经过暹罗，回到出生地马来亚去，在暹马两地，住过三年半的时间。”（韩萌，1952，页2）韩萌在叙述中国与马来亚时，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层次，使得中国被赋予“祖国”的意义，而马来亚则被界定为“出生地”。这种差异反映出其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较倾向中国。

相对《南洋散文集》而言的《南洋青年散文集》，很少着墨“祖国”或“故乡”，对中国的向往在当时年轻一代的意识形态中似乎无关紧要。《南洋青年散文集》中，阿兴的〈阿伟的淘金梦〉里有这么描写道：“在家乡的时候，阿伟哥因为受到亲戚们的怂恿，说南洋地方怎么好！生活多安适、工作多轻松，而且处处有发财的机会。这些甜言蜜语感动了他的心，于是他便掀起了到南洋淘金的美梦。经过了许多麻烦的手续，坐着帆船，乘风破浪，辛辛苦苦地抵达这所谓的‘淘金地’南洋。”（有兴，1953，页42）可见当时的南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物质丰饶的地方，在他们的观念中，只要去南洋辛苦工作几年，就可以带着满满的财富回乡

(中国)。然而,事情往往事与愿违,因为来到这里后,他才发现“这里并没有遍地的黄金,一切的一切,都比那多山川河流的美丽祖国还逊色呢!于是他失望了,再加上离乡背井的不安心情,和对异地的生疏,人种语言的复杂,使他陷入空虚渺茫的境遇中。”(有兴,1953,页42)到了南洋的艰苦生活,以及完全无法适应语言 and 环境的窘境,迫使阿伟“除了他手上从祖国带出的一只小戒指外,没增加一厘半毫。”(有兴,1953,页43)过了五年,生活还是依旧潦倒,使得阿伟进退两难,想回到自己的祖国(中国),却只能够滞留在南洋。懊悔和愤怒不禁油然而生,在饥寒交迫的情形下,对中国的思念,就更加深刻了。

二、拥有“双乡经验”的张復灵和韩萌

张復灵是《南洋青年散文集》的编者,里头收录了26篇新加坡和马来亚青年的散文。张復灵的生平并无收录在郭惠芬的《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1919-1949)》、林万菁所著《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以及当代潘碧华及马仑合编的《马来西亚作家传》,成了遗珠;然而张復灵父亲张怀真,是广东省县城南白土乡(今梅江区三角镇场林坪村)人,是清朝秀才,在汕头与叶楚伦等人创办《中华新报》等,并任总主笔。后因日卢沟桥事变,张怀真就李昌奉刺杀日本天皇未遂撰写了题为《惜乎不中》的社论,在《汕报》头条发表,继而引起“汕头事件”。张怀真被拘捕,之后他又再度发表社论于《汕头》,阐明自己的立场,表明宁愿自杀也决不妥协,可见张復灵的父亲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傲骨之人。他鼓励他的五个儿子继承父业,张復灵作为儿子之一就在战前离开中国,到南洋从事报业和教育业(梅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1,页675-676)。有关张復灵在南洋的研究成果,可以从马来西亚霹雳客属公会所发行的《客家:霹雳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刊》中,张所做的研究〈客人在马来亚〉〈中国歌谣与客家歌谣〉(梁树龄、丘乔等,1951,页111-140、207-300),及张復灵的哥哥张综灵的研究〈外国人眼中的客家〉(梁树龄、丘乔等,1951,页301-310);另外,《南洋研究》及Jessieca刘的《世界客家人——重塑中的客家身份》中也可窥见张復灵对客家文化的相关论述(Leo, 2015)。综上,可推论出张復灵到南洋之后做了很多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显示他浓厚的中国属性,对于自己民族的根、籍贯的追溯,都背负着传承的使命。

关于张復灵的中国性,可以从他在《南洋商报星期刊》写过的一篇社论《今日中国人民的愿望——和平》中,对于中国发生的内战及各国华侨所面对的困境提出了一些想法(张復灵,1949)。他的社论中国属性强烈:“大多数国民对内战的看法,都认定是不必要的,以对自己的国家而言:现在最需要的是安定。”(张復灵,1949)他对于国内发生的战争以及日本在中国所引发的民生问题感到担忧,并且呼吁停止内战,停止劳民伤财,尽快重建和恢复百姓的生活。文章之中多次

称“中国”为“我国”，称南洋华人为“华侨”，并希望中国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实现和平与繁荣的愿景。张復灵的叙述方式更像一个来自中国的学者，以第三视角来看待南洋这片土地，可见张復灵继承了他父亲忧国忧民的文人传统，即便离开了中国也依旧心系故乡。此外，张復灵继承及发展了他父亲以文救国、发表文章、投身教育等，可见早期在中国的生活使他更能够将该地视为“故乡”。完成传承中华民族使命的同时，也散发着一一种思乡的情绪，所以借助研究客家文化、编撰书籍等慰藉思乡情绪。在选文方面，《南洋青年散文集》的选文并没有像《南洋散文集》里的选文一样，散发着一一种对中国这个“故乡”的惆怅与离散之感，较多是小儿小女的呜呼哀哉、以及对未来升学机会渺茫的困扰等。

韩萌（1922-2007）出生于马来亚，并在马来亚生活十三年，之后回到广东普宁。韩萌的童年时期在马来亚度过，青年时期在中国度过；1947年之后他南来新加坡执教，两年后到香港工作，1950年回返中国，之后便再也没有来马来亚。类似韩萌这样出生地在南洋，之后归侨的作家群大有人在。像韩萌这样在中国与南洋两地来回居住的作家，到最后回到中国的作家有杜运燮、萧村、米军、秦牧、巴人、洪丝丝等人。韩萌在文坛较活跃于1948年至1950年间（郭惠芬，1999，页111）。虽然，韩萌的《南洋散文集》成了郭惠芬收录的《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马华文学：1919-1949》的遗珠，也没有关于他本人的详细介绍，但是这本散文集也可说是纪实的重要文学作品集。韩萌十三岁以前在马来亚长大及生活的体验，促成了他本质之中的“南洋”风味。他的其他作品还有长篇小说《七洋洲上》（1949）、《在古屋里》（1950）、《寻根奇遇》（1987）、《台湾归来》（1989）、《归侨梦》（1991）离不开南洋华人的归“乡”（中国）之情，同时也和《南洋散文集》一样，离不开抗日及爱国的形式和中心思想（钟怡雯，2017，页164）。

《南洋青年散文集》共有26篇文章，主要叙述了战争之后南洋青年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抒发了他们在战后生活压力之下可能面对必须辍学的压力，少数层面描写了当时旁人对于回乡的惆怅之感，只有一篇文章写了关于日军侵略马来亚的可怖回忆（写于1953年）。《南洋散文集》里头收录了34篇文章。中国从1937到1945年经历了八年的抗日战争，1945到1950年经历国共内战，而在1941-1945年遭到日军侵略。从这两条时间及历史交叠的共同因素上，在这十年之间取样编辑，更可以探视当时南洋华侨对“乡”的转变、错位与定位。旅居南洋及中国两地的作家，在体验两地的历史经验与在地文化之后，可能会产生“时空错位”的可能：有的作家出生地是南洋，照理南洋的一山一水就是他们的“故乡”，可在大环境的影响下，部分文人却视中国为“故乡”，这样的现象在《南洋散文集》里可见一斑。

战后，作家开始以“伤痕文学”的形式将战争时期的种种残忍与悲苦抒写出来，所以战争时期的作品主要也是在战争之后才发表（或回忆），但写作时间仍旧是战争时期；钟怡雯在《下南洋，返唐山——〈南洋散文集〉的移民是缩影》里写道：“选文从缺的四年（1942-1945），主要是因为太平洋战争时间，马来亚、新

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区多有的中文报纸几乎停刊, 报人四处逃难, 没有文学发表园地, 文学作品的发表自然挂零。……这四年间, 韩萌可说是无文可选, 故其选入的作品只能以战后为主。”(钟怡雯, 2017, 页 164)“无文可选”中的“文”应该是指战争时期的作品, 若就时间逻辑来推测, 战争时期的作品在战后才以回忆录的形式来表现, 其实还不至于“挂零”。比如萧天的《夜笛》, 于 1945 年 1 月写成, 距离战争结束尚有 7 个月。韩萌在他的前言之中并没有提及选文的标准, 但说明了编辑动机, 主要是: 一、给南洋的文艺工作留下一点痕迹; 二、给南洋的读者增加一些精神食粮; 三、向国内读者介绍海外华侨的生活; 四、给研究南洋问题的专家们准备一份参考资料(韩萌, 1952, 页 2)。可见, 韩萌笔下的南洋往往是“被观察”与“被描述”的对象, 而非以在地华人的主体位置对南洋展开叙述。郑明标曾说过他的作品:“在韩萌的作品中, 常常有他的出生地粟巴村的兴衰记、契约华工‘猪仔’的血泪史, 以及侨居海外的华籍文化人与教育工作者为传播中华文化, 建设马华新文学和从事抗日救国的辛酸泪与抗争记录。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 反映海外赤子和天涯旅人的思乡情绪。”(郑明标, 2007)文中的“国”泛指“两国”, 即马来亚和中国, 但韩萌仍旧是以中国作为“祖国”和“故乡”的依据。可见《南洋散文集》所收集的作品主要突出抗日殖民或回归祖国, 与他本身的文人视角和对中国的向往有着莫大的关系。

张复灵编选《南洋青年散文集》的编辑动机相对“随性”简单。从事教育工作的张复灵并没有说明他是以什么管道和征稿方式收集学生的文章, 对于选文的标准和主题类型也没有明确说明, 他在前言这么说道:“这一本集子, 所收的都是南洋华侨青年的作品, 它固然还不是成熟了的果实, 可能只是广大的原野上面的几株小草而已。不过, 就是几株小草也好, 有了它们, 已把已像寒冬一样的原野, 衬托得有一天春天的气息了。……我特地把这些小草栽在一起, 并将之献给一般爱好文艺的青年学生们。我想: 它是能够增加一般无邪的青年学生们生活的兴趣的。”(张复灵, 1953, 页 3)张复灵的编辑动机单纯朴实, 纯粹只是为了编撰一本学生的作文集, 的确不如韩萌的编辑动机, 尤其在“向国内读者介绍海外华侨的生活”、以及“给研究南洋问题的专家们准备一份参考资料”的基础上。

《南洋青年散文集》除了没有说明选文的征稿条件和主题等, 我们也无法得知作者的生平、以及选文的作者是否局限于单一地区/机构的青年。根据资料显示, 张复灵到南洋之后多从事教育及文化方面的研究。若张使用自己作为教育界人士的身份征稿, 效果肯定较韩萌来得简单, 稿件也多, 唯一的局限是少了多区域的视野、以及不同的生活面貌。

三、成熟写手与青少年的意识形态：故乡视角的差异

《南洋散文集》收录了战争前后 10 年的作品，总数 34 篇。以十年为限的文集数量实属不足，故只能从仅有的文学作品中梳理当时人们对于故乡的本位思考。

《南洋散文集》以郁达夫在 1941 年做《马六甲记游》开篇，唯有此篇是战争之前所写，另一篇是上文所提及的萧天于 1945 年所做的《夜笛》、以及战后才写战争时期回忆的《野恋》（无标明创作日期）。

郁达夫以第一视角和外来者的游客身份写《马六甲记游》。游走他乡的陌生与渐渐产生的倦怠感在他的文章中频频出现。他说马六甲的工作与生活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煎熬：“在长年如夏、四季不分明的南洋过活，记忆力只会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尤其是关于时日年岁的记忆。”（郁达夫，1952，页 5）这种令记忆力“一天天地衰弱下去”的根本原因是因为马来亚炎热的天气，使到习惯以四季作为时间分界点的郁达夫来说产生一种“时间错乱”，误以为夏天久久不散，期待的冬天春天迟迟未到。可能在家乡（中国）的时候，四季之分是各种农耕工作或收获的预告；到了马六甲这个炎热的国度，没有四季，常年如夏的潮湿国度，顿时分不清“日年岁”了，所以好似记忆里只停留在夏季，慢慢地便感到疲倦。他写道：“精巧玲珑的马来人亚答屋的住宅，配合上各种不同的椰子树的阴影，有独木的小桥……，这些点缀，分明在告诉我，是在南洋的山野里旅行。……但一转向，车驶入了平原，则又天空开展，水田里的稻秆青葱，天腾树影下，还有一二皮肤黝黑的农夫在默默地休息，这又像是在故国江南的旷野。”（郁达夫，1952，页 6）郁达夫把自己放在“倦游人”的身份，并毫不避讳地说自己游倦后想思乡（中国）的心情。在他这里，映入眼帘的是“马来人亚答屋”“椰子树的阴影”“独木的小桥”等南洋景色，充分地唤醒了他对于“故国江南的旷野”乡愁。这样的叙述和一般的游记稍有不同。游记一般是对于所见所闻的事物和景色大表赞美之情，而郁达夫是将南洋特色的景物用作呼唤故乡记忆的元素。可见这位“外来游客”的故乡，很明确地指向中国江南。故乡的景色才是最美的，南洋的景色再美也只能使他头晕目眩，记忆衰退，因为他喜欢四季分明的故乡。

《南洋散文集》里绝无仅有的一篇战争时期的散文，就是萧天的《夜笛》。战争期间，处处哀鸿遍野，人们每天生活在触目惊心的生死场面之中，情感细腻的作家们更是面对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及对死亡的恐惧。萧天眼前所见都是死亡与凄凉，他这样写道：“夜，是一片片沉寂和凄清，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我仿佛独自徘徊于荒凉的废墟上。其实废墟也未必会这样的空虚，那里也该有幽怨的虫鸣；在惨绿的磷火、忧悒的风声。然而，这里有的是黑暗与窒闷。这夜，是寂寞凄凉的深夜。我想起了祖母的叮咛：‘坚守着吧，挨过黑暗的长夜，便是快乐的黎明’。”（萧天，1952，页 99）沉寂和凄清，连该有的自然星辰都没有出现在夜空中，可见当时人们对于战争的感伤与绝望。被日军践踏和蹂躏的南洋犹如一片

“荒凉的废墟”，萧天悲观地描写这样的废墟是“凄凄惨惨戚戚”，这些凄惨清冷和哀戚都是因为“废墟也未必会这样的空虚”，透露出空虚寂寞以外，作者内心更深层的孤独。接着，一系列的排比句暗示着遍布死亡的情景：幽怨的虫鸣、惨绿的磷火、忧悒的风声，直接抒发了战争所带来的可怕后果：死亡，以及更多死亡所带来的恐惧。

在《南洋青年散文集》里，年轻一代对于战后或者祖国（中国）的忧患意识不高，当中少数描写了日军侵略马来亚的史实，如严然的《烙印》写了自己的表哥在死于日军手下（有兴，1953，页 53-56）。俊萍的《被侮辱与损害者》里就写了一些关于当时人们对于南洋的想法。一个十六七岁娇滴滴的姑娘被乌牛叔骗到南洋来卖身，之所以容易骗，是因为少女本身就有淘金梦，也想要嫁个五官深邃的“峇峇”。即便少女不从，迫于无奈也只好适应当下的环境。结尾处这么写道：“她这样一天一天地生活下去。渐渐地她觉得无聊、寂寞、空虚、渺茫。……如今，她受到良心的指责，她怀念他的‘唐山’的父母，以及她的故乡（中国）。”（俊萍，1953，页 12）虽然文章虚构的成分居多，但是中国人因为非自愿的关系而下南洋的情况，或多或少也反映了他们想要回归故乡（中国）的心情。

四、“乡愁”的变化

在《南洋散文集》中，战后散文包括一些游记、战后回忆录、在地的所思所感等。这些文章中不难发现大部分作者都是以一种外来者的视角来看待马来亚。这种外来者姿态有时呈现一种傲视的姿态，他们认为只有中国才是唯一的心之所向。他们来到南洋这片土地是没有依恋、也没有归属感的，更别说想在这里落地生根。这些文章之中更值得关注的是编者本人（韩萌），即便是土生土长的马来亚华人，韩萌对于南洋的书写，经常伴随着负面的情绪经验，对华人在南洋所遭遇的处境以及种种困境，表现出强烈的不安与焦虑，而对于中国则呈现较强烈的情感认同。他在《在曼谷上岸》中，一开始写自己从中国乘船来暹罗的糟糕的经验：“十年前，我随着父亲航过这辽阔的大海，第一次投回到祖国的怀抱里去。在船上，我晕了，呕吐着，记得我当时曾发过誓：‘我死也不再~~到南洋去~~……’然而，现在，我又不得不被装在这黑暗、潮湿得令人窒息的统舱里来了，一种被强迫而起的屈辱的心情在蹂躏着我。”（韩萌，1953，页 52）他没有说明第一次离开南洋之后为什么会有“死也不再~~到南洋~~”的想法。但在命运的摆弄下，他再次来到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这令他感到晕眩及呕吐，更是有一种“被强迫”和“受屈辱”的愤懑。可见他对于重游南洋是万分嫌弃的。这片生他养他的南洋，此刻正在折磨着他的心情。

在踏上曼谷的码头时，他甚至对于自己的同胞有一种蔑视的心理：“我站在甲板上看着这些拥挤者，也看那些穿破黄制服的暹罗警察在谩骂着我们的同胞，心里觉得无限羞耻，脸上阵热阵冷。”（韩萌，1953，页 54）狭窄肮脏的船舱成了韩萌的梦魇，而上岸以后看见的“一群穿着破黄制服的暹罗警察”这一叙述中，“破黄制服”的描写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反映韩萌对于当地环境（南洋）的负面感受。此刻，他眼看着自己的同胞被这一群他曾经蔑视的警察所谩骂，因此心里产生一种“羞耻”：具有五千年文化的大中华民族，居然被一群没有文化的南洋警察所呼呼和斥责，心里的愤怒到了极点，却又不为自己的窘境而感到无奈与羞愧。“在曼谷耽搁了半个月，我决定再踏上旅程，回到阔别了十年的马来亚去。”（韩萌，1953，页 55）然后，他遇到了亚连——一个没有文化知识，教育程度不高，却和他命运相同的年轻人。亚连在曼谷无缘无故被逮捕，十分委屈，因此打算去合艾找他的表姐。文中处处体现作者的“愁苦”，而这份愁苦事实上指的是他们在船舱上所经历的一切苦难所引发的悲愤与愁绪，以及无奈离乡的苦闷，当中明明白白地说出自己离开“祖国”（中国）的不情愿。

方作斌的《验粪——中国人民出国的经历》。《验粪》无论是中心思想或写作样式，其实和《在曼谷上岸》有许多雷同的地方：他们都写在曼谷上岸以后所看见的种种令人恶心和感到羞耻的一种现实状况。《验》仔细地描写医生在抽取粪便样本时，华人受到近乎侮辱的境地：

把裤子脱落，头垂下，手按着地板，像大人学玩小孩子“爬老虎”的把戏一般地，把脱光光的屁股，使着像要大便的力气，隆起翘上，让医生用那支长玻璃管插进去。……最难堪的，不少人因过度的怕羞，当那冰冷的玻璃管插进他们的肛门时，屁股免不了要缩一缩，可是这么一来，就惹起那些医生们哈哈大笑，甚至有的还在他认为颇肥嫩的屁股上拍一拍巴掌。（方作斌，1953，页 60）

前面写华人验粪时必须脱裤的困窘，后面写华人被医生们当做笑话的窘况，深刻地让方斌体会到身为一个华人所带来前所未有的尴尬难堪。在他的笔下，医生们仿佛是一群穿着白袍的伪君子。这群医生对抽查检验的专业工作显得轻浮与怠慢，对病人或被检验者的害怕与恐惧不但漠视和置之不理，还羞辱式地“哈哈大笑”，更甚的是轻蔑地“拍一拍巴掌”。非但凸显医生们的鲁莽与不专业，还体现了中国虎落平阳被犬欺的一种羞辱——南洋其他种族对华裔的嘲笑与轻慢。作者方作斌认为，这种屈辱的验粪方式，只特别针对来自中国的华人们，因为“他们除了认为中国是一个顶多疾病的民族外，同时也免不了看出我们正在热烈打着内战的关系”（方作斌，1953，页 61）以及“搭客中，因为多数是从蒋党的屠刀下和饥饿的农村逃出来的善良的中国难民”（方作斌，1953，页 59）这两句中可以看见。方作斌与韩萌一样，将整个华族下南洋所受的苦难与折磨，都归咎于

“蒋党的屠刀”。这场内战,在他认为是外国人不屑的道德沦丧:“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愚昧可笑,此刻正招来可怕的后果。

从这《在曼谷上岸》和《验粪》这两篇思想感情表达强烈的文章来看,它们不仅表达了当时华族身为中国人必须承担屈辱与无奈,也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被迫进行侮辱性的动作表示愤怒与羞耻。方作斌在结尾处写道:“三月,赤道线上的太阳,比烈火还要炽热。它不但把每个搭客的希望烧断;同时又把每个搭客身上的水份都烧得干净。人身上的汗水也被晒干了!面部被煎出酱色来了”(方作斌,1953,页62)暗示着南洋的苦难与劳作正在榨干每一个人,连仅有的汗水都会被炽热的太阳强迫蒸发。这是一场折磨人的体验,无论男女老少都没有退路,只能认命地接受苦难所带来的饥饿与委屈。对于老病残弱的华人,他这样描述道:“老人昏倒下去,小孩子在母亲露光的胸脯上的乳头吮不到点滴的奶汁哇哇地哭,就是万一从那将冒出火花来的眼睛里会流出点滴的泪水来,那恐怕也要被强烈的太阳蒸上去呵!……‘新唐呵!今世为何要生为中国人民呢?’许多人都这么叹息。”(方作斌,1953,页62)面对着处处都是老人小孩昏倒和面对饥饿的处境,而这样的糟糕境遇清一色都是黄皮肤的华人所承担,这才是真正让文人感到悲哀的原因。因此方作斌才会有“为什么要成为中国人”的呐喊。根据谢培屏的叙述,在1946和1947年间,由《在曼谷上岸》到《验粪》,都可共计有17万民“新唐”¹来到暹罗(谢培屏,2007,页155-207)。这段时间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战争白热化、国民党占上风的时刻。当时因为战争导致许多地方发生饥荒,汕头居民大批来到南洋谋生。原先回到中国的华人也纷纷从汕头撤出逃到南洋发展,韩萌便是其中之一。可见这两篇文章都具备“纪实”和“写史”的功能。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更容易梳理当时华人困境所建构出对于“故乡”的情感与矛盾——他们并没有因为中国的内战而痛骂自己的故乡,而是怪责国民党;人们也并没有因为“内战”而放弃回国的希望,相反的“回乡”都成为人们心中梦寐以求的最终目标。

陈言《善变的人》是《南洋散文集》中难得展现诙谐与幽默的一篇文章。陈言的老友王立志,也称老王,是一个南洋小地主。老王多次激烈亢奋地说要回“祖国”(中国),可是都因为南洋情人而留了下来。他经常跟陈言说:“老友,这次我要回国去了。”(陈言,1952,页115)作者对于老王的信口开河已经见怪不怪,他说:“听他说回国,已不止这一次,早在南京解放后,他就嚷着回国回国,可是嚷着只是嚷着。”(陈言,1952,页116)不止陈言一人会鼓励他回国,其他的朋友亦然。老王轻蔑的措辞,突显陈言的了然于心——他知道老王无法下定决心回中国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南洋情人。这般复杂的情感其实陈言完全看在眼里,他说:“我看得出他的感情和理智正在搏斗、轰炸、反攻、家庭和爱人、进步和落后……一连串的问题苦恼着他。他一方面渴求进步,想自由地飞向天空;开,挣,可是一方面就像有一种无形的巨手把他拉住,把他压住,他摆不脱。他烦恼,

¹ 韩萌在:《在曼谷上岸》一文中对“新唐”的注解是:在暹罗,从中国南来的华侨称作“新唐”。

我也烦恼了。”（陈言，1952，页 118-119）这名南洋情人可能会断了他回乡的念头和决心。在爱情面前，回乡也好报效祖国也罢，都成了次要的考量，在爱情降临的时候，这样的雄心壮志变得不堪一击。身为旁人的陈言看得见老王的挣扎，因为老王似乎肩负着大伙儿的理想与愿望，但是一方面不想辜负爱情，或者说，希望拥有爱情，因此才会出现“感情和理智正在搏斗”。文中那句“就一种无形的巨手”，明显就是“丘比特之手”，属于爱情的召唤。

与前两篇不同，这篇文章的主角老王算是一个生活已经稳定下来的华人，与狼狽下南洋的华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安居乐业的前提之下，爱情成了生活之中的润滑剂，于是“回国”成了生活中非常次要的事情：中国是一个被动的存在，爱情却是主动的存在。他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因此，当时部分华侨选择继续留在南洋落地生根的原因，不外乎是在这里遇到了“可以留下的原因”，就像老王说的：“回国不回国，没问题，只要自己有决心，还不是一样可以进步？说着，他哈哈大笑，挽着他的太太，手一扬，说：‘有空到我家玩！不，那是甜蜜的窝，到我甜蜜的窝来玩玩吧！’”（陈言，1952，页 122）在老王看来回国并非让自己进步的唯一途径，暗示着自己从前的想法是狭隘的。老王婚后的“家”，更被特意强调是他们“甜蜜的窝”，“窝”远比“家”和“乡”来得亲昵和暧昧。

由此可见，当时选择留下来的华人已经在南洋扎根，对于回中国的事项是心甘情愿地放下，并从此把心思和对土地的热爱放在南洋之中，更可能从此压根儿觉得南洋才是自己最后的故乡。老王这一“善变”的角色在文章中显得可爱幽默，但是以韩萌的编辑理念而言，或许这并不是一种赞美或期许，值得注意的是，《善变的人》呈现出与文集中多数“回乡”叙事不同的倾向。老王最终选择在南洋发掘的爱情与后来建立的家庭，而非返回中国，这部作品成为文集中少数应约流露出扎根意识的篇章。比如这一段：他妻子两人“在房门外一闪，不见了，只听得一阵脚踏楼梯的声响。他们走了，留在房间里是一片寂静。”（陈言，1952，页 122）这句与文章开头说老王嚷着回国却“只听楼梯响，不见有人来”（陈言，1952，页 116），首尾呼应。文章一开头已经暗示老王最后的选择以及他留在南洋的结果。作者对于这样的结果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祝福，只是略写朋友们与老王和他的新婚妻子庆祝一番，文末却是以带有贬义的谚语来表示自己的感受。文末两夫妻“脚踏楼梯的声响”便是婉转地表示自己的预言成真，两夫妻“不见了”、“走了”，暗示老王和他的妻子已经离开他们这群朋友圈，志不同道不合的结果就是“留下一片宁静”。这片“宁静”在结尾处形成一种文字张力：它一方面揭示陈言对于朋友选择爱情而自己感到无奈和无法理解，也暗示着他们彼此之间已经无话可说。老王已经有他的去处了，那么陈言也只能保持沉默。宁静与沉默在文章结尾处留下豹尾，让人不禁反思“善变”的诙谐幽默，背后或许存在着陈言所要表达的讽刺与不满。

在《南洋散文集》中, 也有不乏文章强调的是对中国的不舍, 南洋生活只能算是勉强适应。比如叶剑平在《觉醒》中写道: “晚上, 我和表弟睡同一床, 他告诉我: ‘中南航线一通, 我立刻就要返唐山去。’” (叶剑平, 1952, 页 66), 辛芷《富良江畔的种子——怀念寒江》: “安南我还有一个家。家在向我招手, 我还是要回去的。” (辛芷, 1952, 页 93), 潘军《骑楼下的写信先生》写: “朋友, 你们还年轻, 以后总得回家乡走走吧!” (潘君, 1952, 页 159) 以上几个例句中可以发现, 不同的篇章对于回乡 (中国) 的目标是清楚一致的: “我立刻要返唐山去”、“我还是要回去的”、“以后总得回家乡走走吧!” 明白地道出他们回中国的心愿是迫切的。

但是, 也有一些作品隐晦认同马来亚, 比如潘军《骑楼下的写信先生》中, 主角写信先生给很多人写过信, 而某一位年老的先生却把信讲得最凄惨: “唉! 难得南洋是好地方! 朋友, 我可一生在这儿完了。我的先辈原是在荷属占碑做小生意的。听说日子还好过, 所以, 我就带着希望, 不远千里而来。但是, 到这儿以后,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 ‘荷属’ 的入口证做不通了, 于是, 我就留在新加坡, 心里想, 好吧, 新加坡也好。唉! 我就留在这个 ‘好地方’ 了。” (潘君, 1952, 页 150) 这位老先生对自己似乎是被其飘来南洋感到悲哀。他听说新加坡因为是殖民地, 所以在中国内战纷纷扰扰的年代能够来到南洋, 至少也有个生存下去的希望; 无奈自己的入口证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 只能滞留于此, 唉声叹气地说服自己留在这个自己一点也不喜欢的 “好地方”。“好地方” 是褒义贬用的描写手法, 给那些选择在南洋落地生根的华侨狠狠打脸——他并不是心甘情愿留下, 也没有热爱这片赤道的风光土地、蕉风椰影。老先生事实上对于留根南洋是无可奈何的。潘军还为落魄老先生的思乡情怀下注解: “他们热爱自己的家园, 怀念自己的故里。……家乡困苦, 但终是比流落异地遭受迫害来得好。” (潘君, 1952, 页 159) 句子中的 “自己的家园”、“自己的故里”、“家乡” 指的都是中国; “异地” 明显剑指南洋, 在南洋所遭遇的挫折比喻为 “遭受迫害”, 可见老先生没有一丁点儿认同这片土地的意思。潘军还继续诠释老先生思念家乡的心情: “愈痛苦生活着的人们, 就愈加爱护和悬 (思) 念自己的祖国! 想到这里, 连我的心也变得酸溜溜了!” (潘君, 1952, 页 159) 老先生把自己回乡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年轻人的身上, 在潘军的眼里看来, 在认同与赞赏之间, 难免流露出一丝不舍的同情与怜悯。家乡与异乡带来截然不同的情感, 更能够刻画出老先生厌弃南洋, 急于回乡 (回中国) 的心情。碍于种种因素, 老先生被迫留在新加坡, 于是只能进行心灵上的自我安慰。

黎田的《山芭校长》和其他选文类似, 校长对于返唐山的意志力是坚定的。这篇文章描写一位学者老伍, 由于家人在中国 (再度被) “蒋匪帮” 逼迫, 死的死伤的伤, 于是老伍来到马来亚避难并在这里娶妻生子。老伍靠着自己的学识教书

赚钱。文章中其实也暗示了老伍已经被“南洋化”的特质：“这一年来，他对新的知识新手得不少，一年多前，在学校常常看到的‘之乎者也’的字，在他的信里已被‘了的吗呢’所替代了！”（黎田，1952，页 132）“之乎者也”是借代中国古文经典的助词使用，“了的吗呢”是南洋华侨交谈说话的惯用语助词。前者表示老伍真的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学富五车；后者则体现了老伍在南洋沉浸了一段时间以后，信里的用字开始被南洋华侨“同化”而不自知。即便是心系祖国（中国），但也意味着真正回乡以后，或许也需要面对自己的语言与中国文化出现差异的局面。

语言的同化描写也可解读为：部分华人真正心目中的故乡已经出现明显转向。虽然总是唠叨着回中国的期盼（或许这也成了一种习惯），但无论是精神上或是思想上其实都已经开始将“故乡”定位在南洋。这也符合上文所提及何国忠的说法：“马来亚华人开始寻找自己新的身份，虽然许多文人或作家本身可能没有察觉到这个变化。”（何国忠，2002，页 35）可见这个“变化”，不但韩萌没有察觉，甚至心系中国的山芭校长也没有察觉。《南洋散文集》的选文整体仍以中国认同为主轴，对于逐渐浮现的在地认同着墨较少。即使部分作品已经隐约流露出故乡重新定位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倾向在文集中并未成为主要论述的方向。因为这样的变化是微妙的、晦暗的、甚至可以强词夺理的否认，所以这种转变更可能会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轻易抹煞。不仅如此，著名的南洋华侨学者郭惠芬也提到过南洋华侨在“二战”结束后，东南亚人民掀起反殖民运动的关系，并努力争取成为合法公民的权利，使得当地华人逐渐加入居住国国籍。从这个时候开始海外华人的国家认同也出现转变，“即由原先认同于祖国中国，转而认同当地民族国家。”（郭惠芬，2019，页 122）

五、结语

《南洋散文集》和《南洋青年散文集》虽然无法以偏概全所有南洋华人对于故乡的感受，但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散文带有一定的纪实层面。《南洋散文集》与《南洋青年散文集》共同呈现了战后马华文学的故乡观念的转型过程。前者仍以中国作为主要认同中心，而逐渐转化为生活经验、社会关系与现实处境所重新定位的情感归属。

他们对于身份认同的定义是有明显的区分：一、是把那样当作是自己最后的家园；二、是铁了心肠一定要回中国，那里才是真正的“故乡”。这种非黑即白的明显区隔，正是由于南洋华人的个体经验乃至群体经验，从具体生活和政治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王赓武教授提到的“东南亚华人具有多重的身份认同”（王赓武，1994，页 245），就明显地说明了海外华侨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下，存在着“多

重国籍”的问题——这里可以从他们以哪里为“故乡”来定义。在《南洋散文集》中所呈现的国家认同, 绝大部分都趋向于效忠中国。可见韩萌的编辑走向是基于他个人的文化定位, 同时也被历史走向影响着选文标准。

1947 年的《马华文艺论争》, 在“争”的当儿产生了一个完美共识: 书写南洋。至于中国方面的各种资料和新闻该不该继续关注和书写才是文人挣扎的点。李玄这样说道: “侨民文艺的存在, 也并不妨碍马华文艺的发展。”(李玄, 1970, 页 274-278) 意识的存在证明了一个强而有力的事实: 海外华侨对于身份认同开始出现转变, 对于文学的走向自然也出现想要摆脱中国、想要独树一帜的现象。“侨民身份”或“在地人民身份”在当时的华人心中已经存在各自的答案, 而不同的答案牵涉到他们对于新的身份变化的认知, 这可从文人企图开创及发展新的马华文学样式所见。长期研究马来西亚华人问题的前高教部长何国忠也表示: “马来亚华人开始寻找自己新的身份, 虽然许多文人或作家本身可能没有察觉到这个变化。”(何国忠, 2002, 页 35) 这也意味着马来亚华人在这战争之后便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位置, 本来以外来者的视角看南洋的他们, 很大部分已经转变成以第三视角看已经回不去的祖国(中国)。虽然这在《善变的人》中可见一斑, 但是更多的是“文人或作家本身可能没有察觉到这个变化”, 或者可以更进一步地说, 《南洋散文集》整体仍倾向维持中国作为故乡与认同中心的叙述框架, 因此对于正在形成的在地意识呈现相对有限。

《南洋散文集》作为跨越历史事件的重要文集, 当时文人和作家所写的文章离不开大环境底下的意识形态及历史经验。相较于《南洋青年散文集》, 《南洋散文集》作为“纪实”的基调较为可靠与真实, 而《南洋青年散文集》只能够从年轻人稚嫩的笔触之中, 推测出他们的所写的文字乃是基于整个群体无意识“回中国”的概念。由此可见, 两本散文合集的不同年龄层的个体与群体之间, 对于“乡”的定义在文章中的字里行间散发较劲的意味。韩萌在前文所强调的“表现当地生活和抒发当地人的情感的散文”(韩萌, 1952, 页 2), 在纪实的基础上来说, 绝大部分是做到了“抒发”和“表现”的形式。美中不足的是, 无论是《南洋散文集》或《南洋青年散文集》, 大部分作品因历史因素而没有经过良好的写作训练, 也无从可考。更仔细地说, 《南洋散文集》的“南洋”只是以作者书写时的地理位置而言, 作家对于“回乡”(回中国)的渴望在选文中不断重复出现, 使得一些游记和散记成了平凡的散文; 《南洋青年散文集》里对故乡的向往和国家认同并没有太多的自我意识, 一方面是因为年轻人一般都是政治冷感, 加上战后年轻人普遍有机会接受教育, 因此对于故乡的定位并没有进行深入思考。单就这两本散文集是否真的可以完整代表大时代的离乱所建构的“祖国”或“故乡”作出明确的定义, 的确很难从一而论, 但可以确定的是, 逃难之中的人们对于回国(中国)的渴望是明显的, 而战后人民的生活逐渐趋向安定。因此, 在南洋落地生根的概念主要也是战后文章所描写的较多, 这也符合了当时青年的文章多数描

写自己对于求学和工作的生活焦虑，少了民族气节的关切，也很少针对中国做出感时忧国的评论。

参考文献

- 陈言（1952）。善变的人。载于韩萌（主编），《南洋散文集》（页 115-122）。求实出版社。
- 方作斌（1952）。验粪。载于韩萌（主编），《南洋散文集》（页 60）。求实出版社。
- 郭惠芬（1999）。《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1919-1949》。厦门大学出版社。
- 郭惠芬（2019）。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五四时期至 1950 年代初期中国国籍作者的域外华文书写。《学术月刊》，12，121-132。
- 韩萌（1952）。《南洋散文集》。求实出版社。
- 韩萌（1952）。在曼谷上岸。载于韩萌（主编），《南洋散文集》（页 52）。求实出版社。
- 何国忠（2002）。《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华社研究中心。
- 俊萍（1953）。被侮辱与受害者。载于张复灵（主编），《南洋青年散文集》（页 12）。马来亚周刊出版社。
- 黎田（1952）。山芭校长。载于韩萌（主编），《南洋散文集》（页 132）。求实出版社。
- 李玄（1970）。论侨民文艺。载于苗秀（主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1）：理论》（页 274-278）。
- 梁树龄、丘乔等（1951）。《客家：霹雳客属公会开幕纪念特刊》。霹雳客属公会。
- 梅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1）。第 31 篇：人物传略-1988 以前逝世的人物。载于梅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梅州市梅江区志：1988-2000》。方志出版社。
- 潘君（1952）。骑楼下的写信先生。载于韩萌（主编），《南洋散文集》（页 159）。求实出版社。
- 王赓武（1994）。东南亚华人认同之研究。载于王赓武（主编），《中国与海外华人》。商务印书馆。
- 萧天（1952）。夜笛。载于韩萌（主编），《南洋散文集》（页 99）。求实出版社。
- 谢培屏（2007）。战后暹罗对华人的移民政策（1945-1949 年）。《国史馆学术期刊》，（13），155-207。
- 辛芷（1952）。富良江畔的种子——怀念寒江。载于韩萌（主编），《南洋散文集》（页 93）。求实出版社。
- 叶剑平（1952）。觉醒。载于韩萌（主编），《南洋散文集》（页 66）。求实出版社。
- 有兴（1953）。阿伟的淘金梦。载于张复灵（主编），《南洋青年散文集》（页 42）。马来亚周刊出版社。
- 郁达夫（1952）。马六甲记游。载于韩萌（主编），《南洋散文集》（页 5-6）。求实出版社。
- 张复灵（1949，2 月 6 日）。今日中国人民的愿望——和平。《南洋商报星期日》，复版第 121 号。
- 张复灵（1953）。《南洋青年散文集》。马来亚周刊出版社。
- 郑明标（2007，10 月 29 日）。风雨如盘赤心可鉴——归侨作家韩萌先生。《汕头日报》。
<http://cstc.lib.stu.edu.cn/chaoshanzixun/chaoshanrenwu/4950.html>
- 钟怡雯（2017）。下南洋，返唐山——〈南洋散文集〉的移民是缩影。《外国文学研究》，（6），161-171。
- Leo, J. (2015). *Global Hakka: Hakka Identity in the Remaking*. Brill.